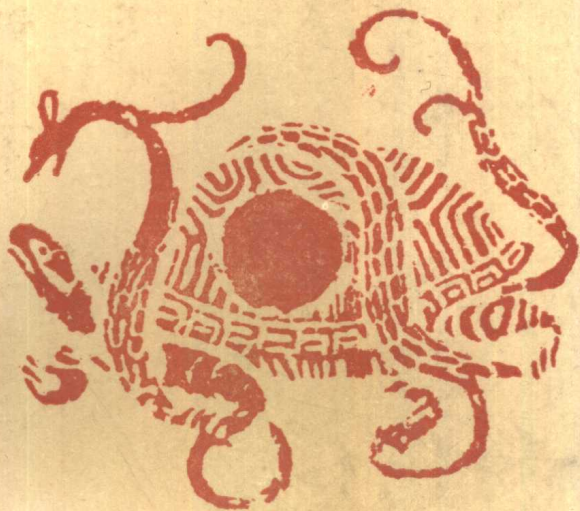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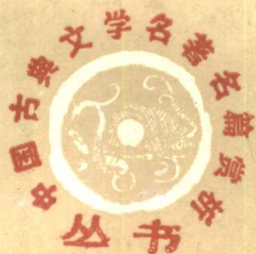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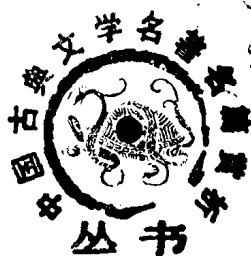
宋诗名篇赏析

殷光熹



宋诗名篇赏析

殷 光 熹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204号

宋诗名篇赏析

Song shi ming pian shang xi

殷光熹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.5印张 247000字

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200

ISBN 7-5302-0213-8/I·208

定 价：4.90元

前 言

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，宋诗是唐诗以后又一个高峰，它在唐诗成就的基础上作了新的开拓，具有与唐诗不同的特色。

宋诗的繁荣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就整体上说，社会发展有它的规律，文学发展也有其自身的规律，包括各种文体也各有其发生、发展、衰退的过程。这三者之间，既不能等同，又不能截然分开，而应当把社会的、文学的、体裁的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，又以各种体裁形式的发展情况为主，方能将问题说清楚。

从数量方面看，宋诗大大超过唐诗。《全唐诗》著录诗人二千二百余家，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。至今虽无《全宋诗》问世，但仅据前人搜集编著的宋诗集看，数量就颇可观。《御定四朝录》收录诗人八百八十二家。清初吴之振、吕留良等编《宋诗钞初编》，目录定为一百家，实为八十四家（其中有十六家未刻）。在《宋诗钞·凡例》里，编者声明“宽以存之”，这就带来收得太滥的弊病。所收作家作品有着前详后略的倾向，如刘克庄的《后村居士诗集》，编者只钞了卷一至卷十六，卷十七至卷四十八全部省略不钞。还有张冠李戴的情况，如把张耒《柯山集》卷十《有感》第三首钞在苏舜钦名下，题目改为《田家词》。后来管庭芬等辑补，撰为《宋诗钞

补》。编者图省事，还常常暗中把《宋诗纪事》和《宋百家诗存》中所收作品拿过来凑数，如《〈南阳集〉补钞》即来自《宋诗纪事》。《〈玉楮集〉钞》又把《宋百家诗存》卷十二照搬过来。乾隆年间，厉鹗用二十年时间编著成《宋诗纪事》一百卷，收三千八百十二家。这是一部巨著。可惜有些书他没有采到，有些书采辑不彻底，有些书采到了但系转引，不大可靠。有些弄错了书名，如卷四十七将称引尤袤诗句的《诚斋诗话》误作《后村诗话》。有些地方漏钞或删削原诗。故在使用这部书时必须审慎鉴别。其后陆心源编成《宋诗纪事补遗》一百卷。但此书的错误更多，有误收唐人诗的，如把王绩（改名王闾）、张碧的诗补入，把金国麻革的诗补入。有些与《宋诗纪事》重复（以上所述详见钱钟书先生的《宋诗选注·序》）。虽然如此，但前人之功不可抹煞，正如钱钟书先生指出的：“没有他们的著作，我们的研究就要困难得多。不说别的，他们至少开出了一张宋代诗人的详细名单，指示了无数探讨的线索，这就省掉我们不少心力。”（同前）除上述宋诗辑集数种书外，还有些书有待后人进一步发掘，据陆心源的《仪顾堂题跋》卷十三载，元代就有一部《宋诗拾遗》二十三卷，编撰者陈世隆，为宋末书贾陈起的从孙。此书《四库全书》未收，厉鹗辑《宋诗纪事》时也未见到。

宋代诗人诗作之多，正好说明宋代诗坛的繁荣。就个人的作品数量来说，像陆游、杨万里这样的大诗人，各人的诗篇均在万首以上（后者保留至今的诗不足万首）。王安石、苏轼的诗集各有数十卷。这种情形已经足以令人惊叹了。在宋代诗坛上，有许多名家和名作，有过重大影响的诗人也有一大批，如北宋的王禹偁、梅尧臣、欧阳修、苏舜钦、王安

石、苏轼、黄庭坚、陈师道等；南宋的王庭珪、李清照、陈与义、陆游、杨万里、范成大、文天祥、郑思肖、谢翱、林景熙、汪元量等。由此可见，宋代诗歌创作的成就是巨大的，它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。后世之所以形成宗唐与宗宋两大派别，就与唐宋诗各自的地位、作用和影响有关。

宋诗能够出现这种繁荣景象，是有诸多原因的。

（一）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为诗歌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适宜环境。

宋王朝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后，在各方面采取了措施，鼓励各地农户发展生产，因而垦田面积扩大，粮食产量大增，茶叶产量也很大。手工业如矿冶、制瓷、丝织、造纸、印刷等，发展速度和质量的提高都很明显。造船技术在当时也远远超过其它国家。商业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，尤其是城市商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，汴京、洛阳、扬州、成都等大城市的商店、客店、酒楼饭馆、瓦肆勾栏比比皆是，昼夜营业。四方游人，络绎不绝，热闹非凡。对外贸易也很发达，广州、泉州、明州、杭州、扬州等城市都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。这样的经济状况，为诗歌创作、欣赏和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证。

由于社会比较稳定，经济情况好转，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，这就促进了人们对文学艺术的爱好，传统的诗歌形式成了人们用来表情达意的工具。宋初诗人生活在这天下太平的时代，有较充裕的时间来研究文学艺术，或者进行诗歌创作。有些身居要职的官僚文人则彼此唱和，消遣时光。如以杨亿、刘筠、钱惟演为代表的西昆体诗人，垄断诗坛数十

年。一批进步诗人不满于这种现状，先后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来与西昆体抗衡。如王禹偁作诗，崇尚杜甫、白居易，诗风简淡。被称为宋诗开山祖师的梅尧臣，主张作诗应“意新语工”，写过一些较有深刻意义的诗歌。他的诗风深远古淡，正如龚啸所评，梅诗能“去浮靡之习于昆体极弊之际，存古淡之道于诸大家未起之先，此其所以为梅都官诗也”（《宋诗钞·宛陵诗钞》引）。与梅尧臣齐名的苏舜钦，诗歌风格超迈横绝，自出机杼，与梅诗的深远闲淡又不同。刘克庄说：“苏子美歌行，雄放于圣俞，轩昂不羈，如其为人。”（《后村诗话·前集》）。

然而，被人称为太平天下的北宋，实际上也不是平安无事。外有辽国、西夏的威胁骚扰，双方时战时和；内有各种社会问题。宋仁宗庆历年间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已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，连宋仁宗也受到震动，感到有必要采取缓和矛盾的措施，于庆历二、三年间分别任用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、欧阳修等人担任参知政事、枢密副使、谏官等职，责成他们更张政治，以“兴致太平”。范仲淹、欧阳修等人在政治上进行革新的同时，也倡导诗文革新。欧阳修等虽然被排斥出中央政府，但他在文坛上的影响却愈来愈大，德高望重，人心所向，自然成为文坛领袖。他写了许多平易疏朗的诗歌，一洗西昆体绮靡晦涩之习。

宋神宗当政时期，任用王安石变法，中心环节是通过发展农业生产以达到富国的目的。王安石前期的诗歌创作，常常是他“言志”的工具，长于说理，精于修辞，风格遒劲有力，偶有深婉之作。苏轼的诗，成了他抒情言志的重要手段。苏诗数量多，内容广，手法新，才气大，纵横古今，挥

洒自如。他的许多诗，如江河奔腾，雄奇奔放，一泻千里，有着自己的独特风格。他那惊人的创造力，超人的审美能力，广泛的艺术情趣，使多少诗人为之倾倒。但由于时代气氛的感染，宋诗的“以学为诗”、“以理为诗”的倾向也在他的诗中有所反映。与苏轼齐名的黄庭坚，被称为江西派始祖。作诗取法杜甫，尤其注重研讨杜诗及诸家诗作的技巧，在诗法上下功夫，并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些主张。刘克庄在《江西诗派》一文中指出，他的诗，“会萃百家句律之长，穷究历代体制之变，搜猎奇书，穿穴异闻，作为古律，自成一派。”但往往流于生僻险怪，禅学味浓，模拟习气也很重。与黄庭坚并称的陈师道，诗宗杜甫，又深受黄诗的影响。他是宋代著名的苦吟诗人。黄庭坚说他作诗“十度欲言九度休，万人丛中一人晓”（《赠陈师道》），风格简古。杨一清称其诗“雄健清劲，幽邃雅淡，有一尘不染之气”（《后山诗注跋》）。但他作诗多喜“闭门觅句”，内容狭窄，反映社会生活不够深广。

总之，由于北宋诗人基本上处在太平时代，社会环境的某些优越条件，对文人的创作既带来有利的条件，也带来不利的影响。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在对立斗争中实现的，既然有西昆诗派的出现，必然会有与之抗衡的力量产生。北宋诗坛，自元祐以后，诗人辈出，作品宏富，可以说是宋诗的黄金时代。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可称作北宋诗坛的四大诗人。他们的诗歌创作成就和理论主张，奠定了北宋诗歌的地位。

一一二七年后，南宋王朝偏安江南，迁都临安。面积虽比北宋减少将近一半，但农业生产最富饶的江、淮、湖、广

等地均在南宋境内。这些地区，水利发达，水稻、茶叶比北宋时产量还多。手工业更加发展，技术更为精巧。书刻有很大发展。商品生产、商品流通比北宋更为发达。

南宋朝廷迁都临安后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趋尖锐。原在北方的皇室及文武高级官吏，在南方并无土地，他们到南方后，尤其是武将，便借口抵抗金兵侵扰而大量掠夺土地作为自己的家产。一些“富商大贾之家”，“多以重帛窜名军中，侥幸补官”，利用特权大肆兼并土地，并且“假名冒户，规免科需”（《宋会要》）。水田是掠夺者最集中的目标，因此，长江下游一带的农户损失最为惨重。南宋政府不仅不制止，反而包庇纵容；更有甚者，竟以政府名义强占民田。贾似道当政时制定的“公田法”就是典型的例子。南宋最高统治者也往往以大敌当前为托词，加重税收，下面又层层加码，巧立名目，榨取人民血汗。政府所得钱财并未真正用在抗金武装力量方面，多入私囊或供少数人挥霍。官兵无力抗金，一旦交战，往往溃不成军。散兵游勇，到处奸淫烧杀，与土匪强盗并无二致。

南宋时，民族矛盾虽然上升为主要矛盾，但从上述种种情况可以看出，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，农民起义不断爆发。如南宋初期钟相、杨么领导的起义；南宋中期湖南郴州李全、广西李焞（一作“李接”）领导的起义；南宋晚期汀州晏彪等人领导的起义；还有江西一带的起义等。这些起义都先后被镇压、瓦解而没有发展成为全国性大规模起义。当然，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始终是民族矛盾，阶级矛盾虽然严重地存在着，但它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还得受民族矛盾的制约。从社会心理方面看，人们的民族正义感促

使大家必须首先把主要锋芒对准外族的侵犯。多数人也不能不把抗金的希望寄托在“正统”的宋朝政府和正规军身上。这样，悲剧也就不可避免。

反映民族矛盾、民族战争是宋诗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徽钦二帝被金国俘虏，北宋王朝覆亡，被人们视为奇耻大辱。这一“国耻”，强烈地刺激着诗人们的心灵。从这一时期起到南宋王朝覆灭前后，诗人们创作了大量反映反抗民族压迫和人民痛苦生活的诗篇。他们对宋王朝“竭民膏血而不惜，忘国大耻而不报”，致使“志士仁人，抱愤入地”的情况大为不满，因而以诗歌为武器，向统治者和妥协势力展开斗争。

时代的剧变，给诗人们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变化，从诗歌反映的内容到诗的艺术风格都起着明显的变化，悲壮激越代替了淡泊古朴，沉郁感愤代替了鸟鸣山幽，粗犷大度代替了文质彬彬，大刀阔斧代替了精雕细刻。时代的气氛感染着他们，严峻的现实教育了他们，使他们把深切的感慨注入到诗中。

在北宋、南宋交替时期的诗坛上，成就最大的诗人要算陈与义。他作诗以杜甫为师，面对现实，忧国伤时，多感慨沉郁之音，情调激昂。诗中常有名句，宋高宗尤喜其“客子光阴诗卷里，杏花消息雨声中”之句。后期诗益工，常有人摘句传写，流布甚广。陈与义诗风和诗艺的变化，与他由顺境而又陷入困境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指出：与义“在南渡诗人之中最为显达，然皆非其杰构。至于湖南流落之余，汴京板荡之后，感时抚事，慷慨激越，寄托遥深，乃往往突过古人。”诗人的流亡生活，为其诗注入

了新的血液。“诗穷而后工”，正说明了他在创作道路上的变化情况。他是苏、黄之后诗坛上的又一颗明星。正如刘克庄所评价的那样：“元祐后，诗人迭起，不出苏、黄二体。及简斋，始以老杜为师，建炎间避地湖峤，行万里路，诗益奇壮。造次不忘忧爱。以简严扫繁缛，以雄浑代尖巧。第其品格，当在诸家之上。”（《后村诗话》）

与陈与义同时的诗人虽然不少，但成就都不如他。陈与义之后，诗坛上出现了像陆游、范成大、杨万里、尤袤这样的大诗人。方回跋尤袤诗云：“中兴以来，言诗必言尤、杨、范、陆。诚斋时出奇峭；放翁善为悲壮；公与石湖，冠冕佩玉，端庄婉雅。”这里所说的“中兴四大诗人”，尤袤的作品流传下来的不多，姑且不论；其他三大诗人的诗作，无不打着时代的烙印，程度不同地反映了他们的爱国思想感情。特别是陆游的诗篇，反映了多数人的爱国精神，表达了时代的、民族的呼声，有着旺盛的生命力，成为时代的最强音。“中兴四大诗人”的出现，标志着宋诗的第二个繁荣时期。但自从偏安江南以后，南北暂时妥协的局面形成，一般诗人渐渐把国家的分裂局面、社会的苦难淡忘了，又走回头路，一头钻进“销金锅”，诗风卑靡。到了晚宋，蒙古铁骑的喧嚣声打破了诗坛的沉闷。一部分诗人，以自己的血和泪谱写出激越悲壮的诗篇。文天祥、汪元量等人就有代表性。另外有一批诗人，或遁入山林，或流浪江湖，所作诗歌，都从不同角度表达自己忧国伤时的感情。这些诗人都有着不屈的民族气节，如林景熙的不仕元，谢枋得的绝食而亡，谢翱的长歌当哭，郑思肖的坐卧不北向，画兰草无根土。诗人们正是受了民族压迫的刺激，写出许多感人至深的作品，冲破

诗坛的沉闷空气，使晚宋诗坛重放光辉。

宋诗的发展变化，既有其内在的规律，也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有联系。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，明显地受着政治生活的影响和制约。从诗歌创作倾向来看，进步的和落后的、复古的和变革的并存与对立是贯穿始终的。在整个演变过程中，它不是直线式上升，而是螺旋式地上升的。

(二) 各家思想的渗透和影响，给宋诗增添了不同以往诗歌的新内容，呈现出自己的风貌和特色。

先从儒家诗教的影响说起。孔子说过，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又说诗要作得“温柔敦厚”、“乐而不淫”、“哀而不伤”、“怨而不怒”……如此等等，儒家诗教对历代封建文人的影响是很大的。到了宋代，虽然词作为一种新兴诗体显出它的生命力，但一般的文人学士，仍然不免要把词视为“诗余”，所谓“诗庄词媚”之说，几乎成为不可动摇的“法规”。这显然是把诗和词的文学功能作了过于绝对的分工。在他们的心目中，诗歌是典雅庄重的，是“正道”，是文人的正业；而词不过是茶余饭后聊以消遣的玩艺儿，是“小道”，不能登大雅之堂。但许多文人又不能不赶点时髦，多少也写一些词，但又不愿将它视为正宗，只用“诗余”来表示自己的态度。这叫诗人之词或文人之词。而一般词人又怕别人看不起（所谓“惟以词名家，岂不小哉！”），也要设法凑上几卷诗。这叫词人之诗，其中也有少数人写得好的，如晏殊、张先、刘克庄、姜夔等都是词人兼诗人。这些词人的专长是作词，作诗是余事。由于平时作词的关系，一旦作诗，往往将作词的手法、风格引进诗中。又因词宗婉约，所以词人作诗时又往往带着委婉含蓄、抒情

味浓的笔调，形成另一种格局。词人的诗可以姜夔为代表，他作诗不为江西诗派所囿，能自出机杼，重在抒情，韵味浓郁，精工严整。他在诗稿自序中引尤袤的一段话来说明自己作诗的主张：“尤延之先生为余言：近世人士，喜言江西，温润有如范至能乎？痛快有如杨廷秀乎？高古如萧东夫？俊逸如陆务观？是皆出自机杼，亶有可观者，又奚以江西为？”至于欧阳修、苏轼、黄庭坚、陆游等大诗人，则是诗人兼词人。从总的倾向看，诗歌创作在士大夫文人层最为流行。从这一层人的作品集中，诗多于词的情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词的创作多在低层文人或市民阶层流行，生机勃勃，使人耳目一新。一些有成就的词人，都不同程度地吸取了民间曲子词的营养，提高了词的创作水平。

宋人由于受“诗庄词媚”观点的影响（实质上是受儒家诗教的影响），所以往往以两副面目出现在文坛上。从“诗言志”方面看，宋诗显得更为突出。

第二、宋代理学的盛行，对宋代诗歌创作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。

北宋是理学的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。著名理学家有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、邵雍等。南宋是理学发展阶段，朱子之学逐步确立了统治地位。著名理学家有胡宏、吕祖谦、朱熹、张栻、陆九渊等。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，建立了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。与之形成对抗的有陈亮、叶适。前者称“永康之学”；后者称“永嘉之学”，各有较大的成就。

富有思辨精神和理性色彩是一个时代成熟的表现。理学具有精密的思辨形态和很强的逻辑性。理学的形成和发展，标志着哲学思想的解放。思辨哲学和理性思维的发达，也是

人们摆脱宗教神学和传统儒家经典束缚的一大进步。

宋代理学的盛行，是时代使然。中国封建社会到了宋代，已经是强弩之末——全面衰落的时代。理学家们为了探索“补天”，各自提出了“救世”的方案，做人的道理；加上统治者的认可与提倡，理学家们的著作逐渐成为思想统治的教科书，文人学士常常受到理学思想的熏陶，由人及事，必然渗透到思想文化领域，以致形成时代风气。在一个充满理性和思辨色彩的时代，文人学士势必耳濡目染，受到影响和启发，在自己的言行中表现出来。这种时代风气，也要求诗歌创作有相应的变化，例如诗歌的哲理性。这正好是宋诗另辟蹊径的一大发现。“宋人生唐后，开辟真难为。”（蒋士铨《辨诗》）诗歌的哲理性，可以增强、扩大诗歌的功能，更大地发挥“诗言志”的作用，能更深刻地寄托诗人对宇宙、社会、人生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和认识。正如翁方纲在《石洲诗话》中所指出的：“谈理至宋人而精，说部至宋人而富，诗则至宋人而益加细密，盖抉刻入理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。”风气所及，使得各种文体的创作，大量出现说理和议论的语言。此种情况的出现，从创作倾向来说，有利有弊；从具体作品来看，有优劣之分。我们肯定的是那些寓理于情、形象化地说理、议论的诗，而不是那些脱离形象与情感、干巴巴说教的诗。理学家的诗，多半是抽象说教，实不足取；但也有少数诗篇写得好的，具有诗歌的艺术特质。个别理学家如朱熹所写的诗，则应另当别论。他的诗在艺术上是有成就的，有别于其他理学家写的所谓诗。《贞一斋诗话》指出：“紫阳雅正明洁，断推南宋一大家。”认为可与陆游相比。这个评价是否得当，姑且不论，但至少说明朱熹的

诗，在理学家中是别具一格的。作为大多数诗人来说，作诗喜议论、说理，无疑是受到当时崇尚理学的学术思潮的影响。富有哲理或理趣的诗，在宋诗中为数不少。这类诗，好处就在于扩大了诗歌的容量，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，开掘了诗歌内容的广度和深度，给人启迪，富有理趣。苏轼的一些哲理诗，就是善于将情与理有机地结合起来，或寓哲理于意象，以意象来象征哲理；或化实境为虚境，让人领会其中的哲理；或借助情感的魅力，把哲理思辨引入诗中，不仅没有破坏美，反而创造了美。

第三、佛学的盛行，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影响相当大而深远。

宋王朝的历代君主都崇奉宗教，其中以佛教为主。据高桑驹吉原《中国文化史》云：宋太祖执政时就下令修复寺庙，派遣百人以上僧人到印度取经，刊行《大藏经》。宋太宗时，僧尼多达十七万人，专门设立了“译经传法院”，翻译佛经，僧尼人数猛增至四十六万人。宋仁宗设禅寺于汴京。神宗、哲宗时，名僧更多。当时禅宗势力最大。绅士学者，纷纷与僧徒来往，谈禅悟理，以此为高雅。风气所及，许多诗人受禅宗影响，习染既久，必行之笔墨：或以禅理悟诗，或以诗悟禅理，或以禅理作为诗法的借鉴，或将禅境引入诗的领域，或将诗境纳入禅境的领域。使得宋诗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面貌。其实，禅学是融合了玄学的成分，禅学南宗不过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庄子哲学思想。宋人常把宗教、哲学、文学、艺术杂糅在一起，而又以诗的样式出现。

宋代文人好谈佛理，固然有炫耀高雅的原因，但为什么许多作家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以禅语入诗？原因是多方面的。

诗人们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，精神上需要某种东西来弥补，于是就从宗教中去寻觅，求得精神上的慰藉、解脱。这当中有消极地回避矛盾，也有无可奈何的叹息和怨愤。而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看，禅宗当中的斗机锋技巧，可以作一些加工改造之后引进诗歌创作领域。例如丰富奇特的想象力，生动形象的比喻，思辨的敏捷，哲理的深味……等等，与诗歌艺术技巧确有共同或相通之处。诗人从中可以得到启发，得到借鉴。至于用得好不好，又得因人因作品而异，不能一概而论，还得具体分析，分别对待。但宋诗与佛禅有着密切关系这一点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

第四、宋代绘画的发达，促进了宋诗的繁荣。

宋代绘画艺术在我国古代画史上地位极为重要，名家特多，爱好者更是普遍。由于诗、书、画往往结合成一个整体的关系，大量的题画诗应时而生。许多画家本身就是诗人或者能写诗；或者每当画成时，请诗人在画幅上题诗；或者诗人观画后有感而作诗；也有一些诗人又兼画家；还有以诗句作画的。这样的诗虽然数量相当多，但由于是看画作诗，受到画的局限，加上有许多诗是应酬之作，所以写得好的诗不算多，但也有一些优秀诗篇，为画增添了新的气象和神韵。更重要的是诗画结合，给诗人创作带来了新的天地。许多带有画意的宋诗，充分地体现了“诗中有画”的特点。体现了宋人的审美情趣。“夹路桃花新雨过，马蹄无处避残红”（张公庠《道中》）；“云意不知残照好，却将微雨送黄昏”（郑獬《绝句》）；“林疏放得遥山出，又被云遮一半无”（赵师秀《数日》）；“窗中远看眉黛绿，尽是当年歌吹愁。鸟语夕阳人不见，蔷薇花暗小江流”（法具《东山》）等，充

满着诗情画意，给人以美的享受。

第五、史学的发达，为诗人们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用事用典的知识。

宋人“以学问为诗”的风气，除了理学、佛学盛行的原因外，与史学的发达也有直接关系；对那些主要以书本知识作为诗料的诗人或诗派来说，有着更密切的关系。咏史、怀古自不必说；纪游咏物也少不了它；言志抒怀，美刺时政，更得借助于广博的知识。然而知识的运用和诗的效果如何，还在于诗人的“头脑加工”情况如何而定优劣，即如诗中用典，用得恰到好处，它可以起到其它手法无法起到的作用；用得不好，就会破坏诗的形象。宋人“以学问为诗”的风气，除了理学、佛学盛行的原因外，与史学的发达也有直接关系；对那些主要以书本知识作为诗料的诗人或诗派来说，有着更密切的关系。

（三）帝王的嗜好和提倡。

帝王的爱好和提倡，虽然不是宋诗繁荣的主要原因，但确有一定影响也是不能否认的。在封建社会里，皇帝是至高无上的，他的一言一行都被人们看作楷模，神圣而有权威。上行下效，几乎成为一种惯性。许多文人为了功名，寻求机会能在皇帝跟前显露一下才学，以便得到某种好处。这在宋朝也不乏其例。宋朝开国君王宋太祖不仅爱好诗歌，而且能作诗，写出好诗。如他的《咏月》诗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未离海底千山墨，才到天中万国明。”何等气势！宋太宗对诗也很偏爱，当时的文武官员因能诗而得到他的赏赐的不在少数。据《贡父诗话》载：“太宗好文，进士及第赐文喜宴，常作诗赠之。景祐朝因以为故事。”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：“苏